

战略管理的基础与未来：对中国学术的启示^{*}

□ Jeffrey J. Reuer Michael J. Leiblein 李炜文

摘 要：在过去几十年里，战略管理研究迅速发展壮大，并走向专业化。在取得骄人进步的同时，战略管理领域的边界和未来研究方向也引发了人们的探讨。为推动战略管理领域知识的积累与整合，本文追溯了战略管理的四代学术研究。通过回顾历史，本文得以聚焦每一代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与做出的贡献，探讨战略管理的基本问题和前沿研究主题中的矛盾与机会，并对现有的各种整合机制及其优缺点进行梳理和总结。战略管理的发展历史中还蕴藏着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机会。

关键词：战略；战略管理；公司战略；竞争战略

一、引言

无论如何衡量，战略管理领域都可以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与发展。例如，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 AOM）战略管理分部拥有超过 5000 名会员，已是 AOM 会员规模第二大的分部；战略管理学会（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 SMS）的会员规模在约 30 年的时间里增加至原来的三倍，已拥有超过 3000 名会员。战略管理领域旗舰期刊——《战略管理学刊》（*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MJ）一年收到的投稿超过 1500 篇，论文被引用量逾 30000 次。如今，战略管理领域已经获得了众多大学和商学院的认可，战略管理课程成为了全球的 MBA 和高管教育项目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 本文改编自《战略管理评论》（*Strategic Management Review*）创刊号上的一篇文章，感谢 Now 出版社 Zac Rolnik 准予刊登。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项目“战略领导”（719220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家族企业公司创业研究：基于团队断裂带的视角”（71572198）的资助。

在战略管理不断进步、影响力愈盛的当下，回顾历代战略学术的特殊贡献大有裨益。简要的回顾可以辨明每代学术面临的重大挑战，启发学者们另辟蹊径去解决如今战略管理领域的关键问题。我们的回顾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展开，但也有部分重叠之处。本文并不打算进行全面的综述，仅对战略管理研究多年来的核心主题与特点进行概括与介绍（即使还不太完善），希望能加深对当前战略管理领域的理解。对于新进入此领域的学者，我们推荐他们阅读几篇优秀的综述（Mintzberg, 1990; Rumelt et al., 1991, 1994; Mahoney & McGahan, 2007; Ghemawat, 2016; Drnevich et al., 2020），以帮助他们深入了解战略管理领域的各研究流派、知识基础与发展起源。另外，我们专门在战略管理领域的资深学者中开展了一次简单的调查，从他们的观点及相关数据中，能够窥见未来的研究机会。战略管理领域的关键机会在于整合研究成果、搭建一个坚实而可累积的知识体系，本文列举了许多可以实现这个方法。本文还将结合上述数据和所整理的战略管理领域简史去探讨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机遇和挑战。

二、战略管理历代学术研究

（一）0.0 代：起源

界定战略管理的起源并不容易。一个极端的例子是，MBA 学生以及非战略管理领域的老师误以为一切都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颇为流行

的“五力分析”（five forces analysis），毕竟“五力分析”是早期很多战略管理课程的特色。另一个极端是，Freedman（2013）认为在《旧约》、进化论与动物互动、古希腊思想、《孙子兵法》以及其他非商科领域中都可以看到战略的起源。由此可见，要为战略管理勾勒出一段线性、有序的历史非常困难。再者，虽然“战略”经常被看作“战略管理”的简称，但其实“战略”这个被公认为是抽象且深奥的概念从未与“战略管理”真正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看来，我们需要通过一项综合考察管理实践、管理教学、管理研究的细致研究才能够揭示出这个领域的丰富历史。

回顾战略管理领域的历史，Rumelt 等（1994）探讨了商学院的企业政策课程，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咨询公司的战略著作的重要性。三位学者最终落脚于 Chandler（1962）这部经典著作——《战略与结构》，并将之视为现代战略管理的基石。他们借此强调了组织所起的核心作用（例如，组织结构和制定、实施、评估和控制等组织过程）以及战略管理中“管理”的重要性。伴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战略管理领域的诞生，早期的“战略”概念出现了——参见 Ansoff（1965）的《公司战略》，以及 Learned 等（1965）的《企业政策：内容与案例》（Kenneth Andrews 被认为是此书正文部分的作者）。可以说，重视管理实践、总经理追求组织有效性（即做正确的事情）这两点对于战略管理领域来说就如同胎记般“与生俱来”^①。

^① 在 2017 年战略管理学会的休斯敦会议专题讨论会中，哈佛商学院的 Joseph Bower 适时地提出了运筹学和战略管理的区别。他指出，战略管理“并非是关于电线杆之间的最优距离的问题”，而是涉及许多模糊、复杂而又相互依赖的决策，这些决策能够带领企业“做正确的事情”。

Dan Schendel 和 Charles Hofer 在 1977 年组织的一次会议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战略管理领域的发展进程,同时也推动了未来几年战略管理重要研究机构的成立。后续的会议论文集将当时战略管理迫切的研究需要和机会划分为 18 个不同的细分领域 (Schendel & Hofer, 1979):

①战略的概念;②战略管理过程;③董事会:内外部交互平台;④战略管理中的总经理角色;⑤目标制定和目标结构;⑥社会责任;⑦战略制定;⑧环境分析;⑨战略评估;⑩战略的内容;⑪正式计划系统;⑫战略实施;⑬战略控制;⑭创业和初创企业;⑮多元化经营/多元化企业;⑯非营利组织的战略管理;⑰公共政策和战略管理;⑱战略管理的研究方法。

上述研究需要和机会部分来自一项德尔菲研究,这项研究是在 1977 年 5 月著名的“匹兹堡会议”上进行的,参与者是包含作者、讨论者和主持人在内的 56 人专家小组。针对前述的 18 个领域,他们给每一个领域都细化出一些更具体的研究问题,为未来的研究工作和论文撰写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今天再次审视上述列表,有些领域已显得不合时宜,如组织已与正式计划系统分离;但有些领域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公共政策和战略管理领域的相互作用,这些领域对学术研究、管理实践和整个社会带来的潜在贡献颇大,但却没有获得与其重要性相称的关注度,因此当时将之作为一个独立的细分领域可谓极具先见之明。

近来的学者倾向于将特定的理论或现象,而不是宽泛的问题分类视作个人学术身份的象征。为此, Bettis 和 Blettner (2020) 特别指出

匹兹堡会议上的学者并不仅只对战略管理领域的特殊问题感兴趣,他们还致力于在自己的商学院建立一个新的学科/系,改变 MBA 项目的核心要求,以及建立战略管理学博士项目。为此,他们掀起了一场又一场革命。即便战略管理领域已经获得了如此高的地位,如今的学生或许也难以想象战略管理学先驱们开天辟地的创举,难以深刻体会他们当初付出了多大的代价。Bettis 和 Blettner (2020) 对当时的学术局面和发展情况做出如下总结:

这些匹兹堡的学者为他们的“学术叛逆”付出了代价——他们在晋升或者涨薪方面都受到了挫折。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战略管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远不只成功,还广泛地植根于商学院中,成为了一个基础教研学科/系。没有上述学术革命者在 AOM 战略管理分部紧锣密鼓的努力,没有匹兹堡会议的参与者,没有 Dan 和 Mary Lou Schendel,就没有战略管理这个成功的、备受尊重的商学院学科。

一直到 1978 年,中国的实务界和学术界才开始关注战略管理 (徐二明和李维光, 2018)。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状态,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占主导地位。在中央计划之下,国有企业必须达到政府的产量指标,没有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自由。因此,在 1978 年以前的中国,战略管理并未扮演重要角色。在市场改革后,国有企业才被授予一定程度的决策自主权,真正开始从“行政机关”向相对独立的实体转变。国有企业管理者开始拥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为企业制定战略。

伴随着市场改革,一些中国的管理学者意

识到战略管理的重要性，开始引入西方战略管理理论与研究，如 Ansoff（1965）的《公司战略》在 1980 年翻译出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和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分别在 1978 年、1980 年和 1981 年成立，目的在于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知识交流提供平台。与此同时，《企业管理》《外国经济与管理》等学术期刊也在市场改革之初迅速涌现。尽管这些学术期刊是为了促进整个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而创办的，但它们也确实为战略管理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必要的平台。

同时，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合作项目实施了一些管理培训计划。第一个重大项目是中国政府与美国商务部在 1984 年达成的管理培训合作项目。这次合作促成了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现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的成立，培训中心开设了由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和美国研究机构的教授共同讲授的 MBA 课程。第二个重大项目是 1984 年的中欧管理中心（CEMI），它由欧盟委员会和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共同赞助成立。这个项目每年都招收 MBA 和 EMBA 的学生。

（二）1.0 代：战略管理经典问题的结晶

1980 年 SMJ 的创办和 1981 年战略管理学会的成立为实现匹兹堡会议的愿景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这些早期的讨论清楚地表明战略管理领域不仅具有 Kuhn 所说的“前范式”（pre-paradigmatic）特点，还需要借鉴传统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及其他学科去解决高管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热情日益高涨，不仅学者们需要更多会议和期刊来满足战略管理领域日益高涨

的研究热情，各种研究需求和机会也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实现。这一代战略学术研究以 Rumelt 等（1994）的《战略的基本问题：一个研究纲领》来划定。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们认为战略管理领域不应苛求一个统一的范式，而应力图清晰地解答本领域的基本问题，指引和凝聚研究工作。他们假设一个基本问题可以界定一个细分领域，指引该细分领域的学者。例如，科斯的基本问题是“企业为何存在”，在其他领域也可以看见类似的定义性问题。

基本问题能够指明潜在的前进方向，从而引导和统一研究努力，这是其经久不衰的价值所在。它可以使一个领域得以独立出来，并且可能对其他领域形成挑战（例如，科斯的问题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Rumelt 等（1994）提到有些问题过于笼统，有些问题又难以找到合用的理论或方法来处理。他们对以下四方面感到困惑：组织的性质与决策、竞争如何能够影响组织性质、管理如何影响组织价值或组织成本，以及复杂的全球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动态。于是，他们提出了界定战略管理领域的四个基本问题：

（1）企业如何行动？（即企业如理性人般行动吗？如果不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用什么模型来刻画企业的行为？）

（2）为什么企业间会有差异？（即存在竞争和模仿的情况下，什么还在维持着密切竞争者之间的资源和绩效差异？）

（3）多元化企业的总部具有哪些功能，或者说价值在哪些方面？（即什么约束了企业的范围？）

（4）决定国际竞争胜负的因素是什么？（即成功的源泉是什么？它们在国际背景下或者

全球性竞争中的特殊作用是什么?)

这些战略领域的基础问题必然与现有理论、商科其他领域的主题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依然能保有自身鲜明的特性。Rumelt等(1994)还讨论了组织惯性的重要性,以及政策过程如何产生影响。这本书还纳入了一些“备选”问题(即战略存在吗?产业如何演化?组织竞争力如何产生和维持?),但是因为在当时还缺乏充分的实证基础,或对于未来的研究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①,这些问题并没有被视作基本问题。

战略管理的基本问题如何能够启发战略管理研究?如何能让战略管理保持学科独立性?25年过去了,是时候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了。目前,战略会议及期刊上的许多研究都没有与这些战略管理经典问题清晰地结合起来。基本问题可以为学者和整个战略管理领域提供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①25年之后,组织及其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例如,资本主义的挑战、人工智能的发展等),应如何改进这些基本问题?②战略管理领域的主题范围已向外拓展,战略研究成为二流的金融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风险有多大?什么样的主题属于战略管理领域?又或者,战略管理需要将自身的研究和边界阐释得更理论化吗?③战略管理领域最近强调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战略学者应如何从基本问题的管理实践中汲取经验?

④应如何更好地阐明和保持战略管理研究的特征?

因为战略管理领域终归是一个应用学科,其研究需要反映现实中的组织和环境,所以战略管理的研究主题不是也不应是静态的。但是,无论是期刊,还是商学院组织架构和教学项目,都必须清晰地厘定战略管理的突出贡献和边界。最近几代战略管理研究,学者们陆续在理论应用和发展上取得重要进展,这将产生新的研究框架和工具,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随着战略管理领域发展壮大,其研究方法也获得了实质性进展,战略管理学科在不同的领域变得更加专业化,随之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and 机遇。

在中国情境下,尽管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已经拥有一定的决策自主权,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实务界才意识到战略管理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分别在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上交所和深交所,为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些管理学者继续引入西方战略管理的核心理论,另一些学者则开始关注中国情境的特殊问题。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关注中国企业的研究论文开始发表在SMJ等国际顶级期刊上。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决定推广MBA和EMBA项目。在1991年,“全国试办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① 实践主题和管理决策问题的分类指引着高管的经营和战略的教学。例如,在制定和执行战略上,Hambrick和Fredrickson(2001)鼓励总经理运用清晰的经济逻辑(economic logic)考虑四个战略元素:一是竞争领域(arenas)——企业将在哪里开展业务(如具体的产品品类和地理区域);二是途径(vehicles)——企业如何到达目标领域(如通过出口、授权经营、独资工厂、合资企业等);三是差异因子(differentiators)——企业如何战胜竞争对手;四是阶段(staging)——企业的行动速度与顺序应当如何。上述问题与基本问题中的竞争优势和企业范围的内容相关。他们还提出了竞争战略和公司战略“两个孪生”的问题。竞争战略涉及企业如何获得和维系竞争优势。公司战略涉及多元化企业的管理,以及企业在产品、要素和地理区域上的边界选择(如市场准入、退出、重建、占领、伙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外包等)。总体来说,战略管理研究阐释了组织如何通过其市场行为和资源分配来创造价值。

协作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同时9所中国大学MBA试点项目获批。在1993年、1995年和2001年又分别有17所、30所和6所中国大学获批。由于“战略管理”是MBA项目的核心课程，MBA项目的迅猛发展大大增加了战略管理学者的数量。

谈及中国情境下的战略基本问题，许多重要的问题浮现出来：上述基本问题在中国不同类型的组织适用程度如何？中国的组织会产生特殊的“基本问题”吗？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会集中于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从而促进未来的研究和知识体系的积累吗？还是说专业化和均衡发展才是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特点？西方战略管理诞生之初使用了德尔菲法，我们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去考察如今研究和实践问题的优先级。通过这些研究，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中国、亚洲其他国家和其他非亚洲国家在基本问题上有无相似/不同之处，以及这些相似/不同之处在哪里，还可以揭示理论进步和研究方法的需要，凸显中国战略管理的特殊需要和独特实践，帮助深入理解不同制度背景下的经典战略问题。

（三）2.0代：加强理论基础，促进理论发展

在一系列战略管理基本问题中，边界划定相关的核心问题成为了焦点。这些核心问题也促使人们更系统化地发展和检验相关观点。战略管理研究发展到第二代，当时的学界尚不清楚这个领域是需要一个被广泛认同的统一理论框架，还是只需要一系列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或

假设。随着大量研究者进入战略管理领域，许多实际观察结果被归纳出来；但因为理论基础不够扎实，这些事实并未能很好地与理论联系起来。这个阶段的战略管理学类似于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理论之前的生物学——积累了大量可分类的事实和可命名的现象，却没能找到其中的关联，或者做出可靠的预测。^①

从阐明所研究的组织系统，到把组织系统的相关部分“维度化”，再到提出各部分的相关关系，都需要理论基础的发展。在第二代研究中，战略管理领域提出了一些致力于解决基本问题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大致划分为三部分：①竞争优势理论；②企业组织理论；③资源分配和战略投资理论。在竞争优势理论方面，Caves和Porter（1977）以及Porter（1980）探讨了移动壁垒和产业结构两者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和业绩；Barney（1986）以及Lippman和Rumelt（1982）阐释了要素市场条件如何塑造企业在密切竞争者间的竞争优势；Wernerfelt（1984）、Barney（1991）和Peteraf（1993）厘清了资源禀赋差异如何产生暂时（或持久）的竞争优势。还有一些能力基础的观点通过企业知识基础和能力（Kogut & Zander, 1992；Henderson & Cockburn, 1994）、组织惯例（Nelson & Winter, 1982；Helfat, 1994；Klepper & Simons, 2000）和动态能力（Teece et al., 1997）来解释企业间的差异。还有相关研究考虑了认知（Porac et al., 1989；Barr et al., 1992；Tripsas & Gavetti,

^① Muthukrishna和Henrich（2019）指出：“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支撑研究所提出的假设，实证研究就只能运用个人直觉和文化偏见作为依据。一个坚实的理论框架则可以通过使用正式模型（formal modelling）等方法作出清晰的预测。这样，理论框架便可以作为检验新发现可靠性的标准，即新发现是否能与已有研究相整合；还是说新发现出人意料，还需进一步的审视和复制性研究。这样的理论框架还能使真正的研究焦点得到优先探讨，并常常提供整合不同学科的方法。”

2000)、注意力和主导逻辑 (Prahalad & Bettis, 1986; Ocasio, 1997), 以及组织学习 (Levitt & March, 1988; March, 1991; Levinthal & March, 1993) 的影响。

在企业组织理论方面, 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责任逃避 (Alchian & Demsetz, 1972; Holmstrom, 1979; Hart, 1995)、专用性投资、准租金和合作伙伴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 (Klein et al., 1978; Williamson, 1975) 等关注点催生了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如何影响市场和层级, 以及如何减少这些行为的理论 (Williamson, 1985; Mahoney & Qian, 2013)。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战略管理领域关于交易属性和不同治理模式之间“求同存异”的探讨 (Williamson, 1991)。

在资源分配和战略投资理论方面, 企业在资源分配和组织决策上的差异引发了关于组织内部不同企业和层级间的目标、信息不对称性和权力差异如何影响决策 (Cyert & March, 1963; Simon, 1976), 如何影响组织过程并引导投资机会 (Bower, 1970; Burgelman, 1983) 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探讨流程差异如何影响企业主动探寻市场机会 (Katila & Ahuja, 2002), 以及组织如何利用实物期权的逻辑进行投资, 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 (Myers, 1977; Kogut, 1991; Kogut & Kulatilaka, 1994)。也有相关研究考察企业的投资时机, 研究承诺何时比灵活性更有价值 (Lieberman & Montgomery, 1988; Ghemawat & Ricart Costa, 1993)。

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们对核心战略问题的理解。它们被大量引用并获得了许多研究奖项。上述的很多论文

每年能获得上百甚至上千次的引用, 依旧在影响着当代的研究。例如, 最近的研究在产业结构的领域上厘清并拓展了经典观点, 解释了竞争者、合作伙伴和供应商之间的竞争性互动如何影响价值网 (或价值生态系统) 中参与者之间价值的产生与分配 (Brandenburger & Stuart, 1996, 2007; MacDonald & Ryall, 2004; Chatain & Zemsky, 2011)。强调能力识别、选择和创造的重要性 (Teece & Pisano, 1994; Teece et al., 1997; Helfat & Peteraf, 2009), 或者强调文化和组织在协调活动中的角色 (Kogut & Zander, 1992; Grant, 1996) 的研究可能与早期的“资源基础”研究有关。完善对企业不同理论的理解 (Gibbons, 2005), 将能力与组织结合起来 (Poppo & Zenger, 1998; Foss & Foss, 2005), 或者强调不同形式的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 (Nickerson & Zenger, 2004; Felin & Zenger, 2016) 都可以视作对早期企业范围研究的拓展。整合行为假设和实物期权模型的研究为进一步考察期望、认知偏误和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行为 (Posen et al., 2018) 和组织 (Trigeorgis & Reuer, 2017) 提供了研究机会。上述例子都体现了第二代战略管理研究的理论贡献及其对如今研究的影响。

第二代战略管理研究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拓展了战略管理领域。第一, 理论的发展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认识到应该优先研究哪些问题。严谨的理论不仅为实证检验提供前提, 其清晰而可证伪的假设还缓解了后续实证研究的负担。归纳研究和细致的观察结果也能够带来富有成效的洞见 (例如, 弗莱明在培养皿中发现了盘尼西林), 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在没有清晰的理论

预测的情况下找到一个与理论“相反的”发现。如果有了清晰的理论观点，一个“相反的”发现就对理论背后的假设和理论的边界具有重要的质疑作用，或许还能弄清楚为什么有一个结果没有被发现。例如，实物期权理论认为企业有可能成立国际合资企业（IJVs）以求通过阶段性的合同来降低跌价风险（Kogut, 1991）。然而，早期的实证研究表明 IJVs 的成立并没有降低跌价风险，反而增加了跌价风险（Reuer & Leiblein, 2000），由此便要进一步探索企业在复杂的跨国环境中合理管理期权的能力。

第二，因为组织研究中使用了“企业”等概念，理论发展得以帮助战略管理领域去定义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其中的重要要素更加“维度化”。例如，交易成本、产权、知识基础型组织理论和问题解决型组织理论分别强调了企业的不同维度。这就很自然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组织整体效应是否来自以下这些因素：激励强度、行政控制以及 Williamson (1991) 提到的争议解决机制、其他理论所提出的忠诚（Simon, 1976）、身份和沟通编码（Kogut & Zander, 1992; Monteverde, 1995）。

第三，第二代战略管理研究提出的理论有益于实践。虽然与理论研究无关的负外部性未必会加在研究者身上（甚至有可能因为错误结论的发表而声名鹊起），但对于将这些理论成果应用于实践的从业者来说，理论带来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例如，在医药行业就有许多药物是从错误的研究发现中诞生的（Ioannidis, 2005）。Huded 等（2013）援引了错误的发现反过来使患者受益的例子，包括“针对绝经后女性的激素替换疗法，稳定性冠心病的支架植入术和治疗高

血脂症的非诺贝特”。一个更强有力的理论也可能使人们在将错误的“发现”应用到实践中时更为谨慎。管理领域也会遇到类似的挑战。

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由此需要应对更为激烈的竞争，战略管理的重要性也因此进一步提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其向国际竞争者敞开了大门。同时，中国政府自 1999 年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企业到海外投资。

在这个时期，战略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向西方学习”。越来越多学者归国并获得中国顶尖商学院职位。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协会（IACMR）于 2001 年成立。IACMR 的活动不仅包括每两年一次的国际会议，也包括面向中国学者和博士生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发展研讨会。经过此番努力，许多中国战略管理学者也在 SMJ 和《美国管理学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等顶尖国际期刊上发表了文章。

与学术领域类似，中国的商学院也开始向西方学习。在 2002 年，62 所具备 MBA 开办资格的中国大学中有 30 所获准开办 EMBA 项目。战略管理是 EMBA 的一门必修课。另外，越来越多的商学院追求 AACSB 和 EQUIS 等国际认证。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 2007 年获得了中国首个 AACSB 认证，中欧国际商学院（CEIBS）在 2004 年获得了中国首个 EQUIS 认证。

第二代战略管理研究加强了理论基础，为今天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趣而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战略管理研究的基本假设？哪个战略管理的基础理论对于中国正在进

行的研究最有帮助?更普遍地,在中国情境下的理论整合的前景如何?中国情境研究是应该将西方理论应用在中国情境中,还是应该针对中国面临的管理挑战开发新的理论?

(四) 3.0代:专业化和识别

战略学者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方法发生转变是战略管理研究进入第三代的标志。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识别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①,这里只介绍战略管理领域在这场革命中的情况。识别革命让人们注意到:运用统计技术(如多元回归)寻找相关性背后的因果关系具有局限性。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优缺,需要权衡^②;从缺乏随机性的回归估计中得出因果推断存在问题。在学者们深入了解这两点后,到20世纪90年代,准实验研究大放异彩(Angrist & Pischke, 2009, 2010)。

在战略管理及其他经常需要使用观测数据的相关领域,研究方法的改进使得研究者倾向于采取更能帮助因果推断的研究设计(如使用工具变量和两阶段模型、自然实验、双重差分、断点回归和实地实验)。这些工具也经常用于解释理论和实证之间的不一致。例如,Shaver (1998)指出战略选择是自选择的,因此以战略选择为自变量、业绩指标为因变量的实证回归模型很可能是错误的。例如,海外市场进入方式(跨国收购还是绿地投资)是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成功率?针对这个问题,Shaver (1998)考虑了自选择问题后,发现之前的研究结果其实经不起推敲。Shaver (1998)还启发了

更多学者去解释理论和实证的不一致,阐明战略选择(如自制还是外购)的内生性问题(Leiblein et al., 2002)。

在另一篇著名的文章中,Natividad 和 Rawley (2016)展现了双重差分的优点。针对组织范围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秘鲁渔业受到的一次外部冲击来做双重差分检验,得出了组织范围缩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一定程度上中和了关于组织相互依存性(organizational interdependencies)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的讨论。文章提到“企业可以利用组织相互依存的积极影响去设计他们的组织架构,用组织内部层级代替市场”。但与此同时,“企业也创造了组织相互依存的消极影响,并且这种消极影响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Chatterji 等(2016)为说明实地实验对战略管理研究的推动作用提供了两个很恰当的例子。在第一个实地实验中,作者研究美国城市是否愿意为从(拟定的)创办地迁移至本地的企业提供财政激励,并考察该意愿是否会受到公司来源国不同的影响。这个研究并没有找到歧视海外企业的证据。该研究解决了许多运用观测数据考察外来者劣势的研究中碰到的测量问题和自选择问题。在第二个例子中探讨了企业文化会不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绩效——通过控制员工的身份去研究文化如何影响合作,并进而影响企业绩效。该研究通过控制员工的身份并研究其如何影响合作,测试了我们所认

^① 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如复制危机——许多学科的学者复制现有的研究时失败了(Ioannidis, 2005; Camerer et al., 2016, 2018)。另外,“数据挖掘”、已知结果后假设(harking)和p值操控等研究操作都是有问题的。

^② 不同的理论检验方法各有利弊。例如,McGrath (1981)指出,实验研究牺牲普遍性和现实性以改进测量精度;正式模型则牺牲测量精度和现实性以提升普遍性;实地研究则牺牲普遍性和测量精度以提升现实性。

为的文化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这两项研究表明，创新性地使用实地实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战略管理问题中存在的复杂因果关系。

就技术层面而言，识别革命所提的理由很明显是正确的，但是仅仅只看因果关系的识别可能会给我们的研究问题和对组织战略管理的理解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我们认为“识别革命”有两个副作用：

(1) 仅仅关注识别问题可能导致学者和编辑更偏好于运用识别策略的研究，而放弃不能通过严谨的识别策略作研究的研究主题（如没有现成的实验或工具变量）。

(2) 聚焦于识别会导致学者高估了那些运用识别策略的研究设计所得出的结论。这些识别策略研究设计本身并不完美。能够找到外生变量并不意味着该研究与现有研究相关联，也不意味着该研究对于实践者有指导意义，甚至也不意味着该外生变量对于研究本身是有用或者有趣的。

第一个副作用会影响我们的研究广度。许多界定我们战略管理领域的战略选择（或者使决策具有战略性的选择）都不是随机分配的。由于组织的复杂性和战略管理研究的性质，我们并不总能找到外部冲击来设计双重差分，并不总能找到可行的工具变量（Helfat, 2018）。第二个副作用与运用准实验研究设计产生的观点的质量有关。识别策略只能部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所研究的现象内生于相互因果。只有通过理论才可以在数据中理出一个结构——一个是“因变量”，另一个则是“自变量”（Bettis & Blettner, 2020）。识别策略严谨并不意味着推动了战略管理理论或实践的发展。

虽然因果关系的识别很重要，但许多工具变量并不完美，许多观察结果并不完美，因果推断方法也不完美。严谨的识别策略并不总能解决战略管理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我们更需要思考经典问题，从中提出理论，并将这些理论视作一个整体、仔细检验。我们还需要重视以下两点：清晰的理论可以为实证研究提供支撑；证明实证关联存在的过程塑造了我们对战略问题的思考方式。

由于许多在顶级管理期刊上发表的关于中国企业的研究是在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现象，管理学者呼吁要在管理学研究中考考虑中国情境的独特性。Barney 和 Zhang (2009) 提出，大多数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关于中国企业的论文以西方盛行的理论为基础，运用中国企业去检验或者拓展这些理论。一方面，无论是利用独特的样本或变量，还是通过实验，中国的独特数据都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这种一般性的研究颇受诟病，因为这些结果对中国实务界的作用不大。中国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这些用来理解美国管理者和组织的理论很有可能不适用于中国管理者和组织。因此，管理学者呼吁发展中国的管理理论，用中国特色的方法解释中国现象。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学者应该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研究——研究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独特性，从这种独特性出发，最终发展出情境化的组织理论和管理模式（Shenkar, 2017）。

中国政府以及国内的期刊也鼓励管理学者“讲中国故事”。例如，国内顶级管理学期刊《管理世界》“作者指南”的第一句是“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因此，中国战略管理

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独特现象。

三、未来的机会：本领域的声音

2017年5月，我们开展了一次简单的非正式调查，收集了573位战略管理领域资深学者的意见。我们的调查目的是辨别出战略管理领域的主要贡献、今天的重要研究机会与重大挑战。调查收到了142位学者的回复，既有量化评价，也有开放性问题的非量化回复。为了解研究的潜在趋势和机会，我们还把1980~2015年35年多时间里发表在SMJ上的文章全文及其关键词收集下来扩充我们的调查数据。

调查的第一题是让受访者将100分分配到战略管理领域有可能做出贡献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为总经理或其他领导者提供洞见；建立能够指导战略情境下竞争性行为的理论；提供了跨学科的战略决策方法；使用了精湛的计量技巧；呈现更为贴近现实（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提供的假设更为细致）的决策模型如何影响战略决策；其他。结果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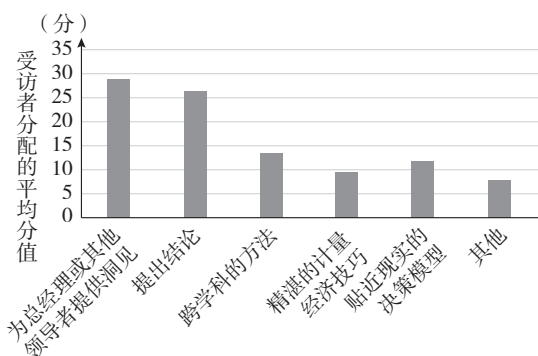


图1 战略管理领域感知的突出贡献

调查受访者普遍认为战略管理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为总经理和其他组织领导者提供了洞见。

跨学科的战略决策方法毫无疑问是此领域研究的重要特征，但这点却极少有受访者选择；其他的特征也是如此，如严谨的计量技巧或者更贴近现实的决策模型选择的人数都很少。有一位受访者仅仅将战略管理领域的贡献简单总结为“帮助企业度过非常时期”。有一位学者说：“战略管理的贡献在于解释企业如何行动、为什么如此行动，还解释了这些行为的竞争结果。”另外一个学者的回答则更具开放性，考虑到了战略管理领域的社会影响：“战略管理帮助组织创造和维持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这不仅增加了社会福祉，也保留和增加了企业资产，从而促进企业生存与成长。”这些洞见应该也适用于中国情境的研究。

调查的第二题用五点李克特量表测量受访者如何看待战略管理面临的挑战，程度从“不重要”到“非常重要”。我们提供给受访者的潜在挑战列示如下：

(1) 这个领域的话题更加多样化/更支离破碎（变得很难与特定利益群体持相反意见）；

(2) 这个领域与界定该领域的经典问题（如竞争异质性、组织范围、管理流程等）之间的联系变少了，更强调新的话题；

(3) 这个领域与传统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失去了独特性；

(4) 这个领域与商学院的其他应用学科（如金融学、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相比失去了独特性；

(5) 这个领域强调理论发展，更少关注于管理实践或在大规模实证研究中获得统计识别（statistical identification）；

(6) 这个领域强调在大规模实证研究中获

得统计识别，更少关注于理论发展和管理实践；

(7) 这个领域强调管理实践，更少关注于理论发展或在大规模实证研究中获得统计识别；

(8) 其他。

在这些潜在挑战中，有两项被过半受访者评为“重要”（挑战4）或“非常重要”（挑战5）。这两项挑战分别是碎片化问题（挑战1：53%）以及强调统计识别而忽视管理实践和理论发展（挑战6：54%）。问题是中国的学者会如何应对这两个挑战。紧接着便是强调理论发展而忽视管理实践和统计识别（挑战5：46%）。结果表明有一些潜在挑战并没有那么重要，尤其是过分强调管理实践（挑战7：19%）。同时，与经典问题缺少联系（挑战2：37%）、与传统学科相比丧失独特性（挑战3：35%），以及与商学院其他应用领域相比丧失独特性（挑战4：31%）这几个挑战也有相当部分受访者比较关心。

从近几年的学术会议、专题和论文中都可以看到此领域潜在的碎片化趋势。总体而言，有些学者认为本领域的研究者正逐渐与此领域的历史核心问题、与其他研究者失去联系。其中一位受访者说：“战略管理在论文评审层面缺乏跨学科对话。”另一位受访者总结道：“此领域的开拓者正在老去、陆续退休，新的学者却未能从历史的视角上看待前人的成果与贡献。”未来研究可以对这次非正式调查做些颇为有趣的延伸——将资深学者的看法与处于职业生涯初、中期的学者关于未来挑战的看法进行对比；在中国重复这次调查，看看中国学者对于现有研究的看法是否与其他国家的学者一致。

同时，针对只强调理论发展或统计识别，而忽视历来强调的管理实践这个挑战的潜在影响，学者间有迥然不同的看法。有一位学者评论道：“本领域需要一个范式理论的分类，而不是理论的大杂烩。”另一位学者则反思道：“主要挑战在于克服理论的‘暴政’——过分强调方框箭头式一板一眼的管理决策模型。”由此，今天战略管理领域的众说纷纭便也可见一斑。

目前识别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一些学者对此持保留态度。有一位学者担心“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过大，战略管理领域会为内生性所累”；还有一位学者担心战略管理“过分强调严谨而失了趣味”。因为这些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依靠广泛可得的数据（例如，SDC数据库关于企业外部发展活动的信息、专利数据和个体流动性数据），“过分关注现有的数据库，研究问题的提出便会受限于那些资源”。

战略管理研究需要兼顾相关性和严谨性。无论是在单个研究当中、研究流派之间，还是整个领域里，相关性与严谨性两者都处于动态紧张状态。学者们之所以会有各式各样的观点，也是这种兼顾的结果。这些不同的视角也反映了此领域的学者拥有的不同的兴趣和技能。

我们可以通过“巴斯德象限”来研究这些学者的观点。“巴斯德象限”既能反映基础理论研究的情况，又能体现理论应用研究的探索（Stokes, 1997）。研究发现，早期的战略研究崇尚密切联系管理实践的应用研究，后续的研究则聚焦于理论本身。在单个研究当中，理论严谨性和管理实践实用性两者往往不可兼得，但我们相信，在整个战略管理领域层面，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两者的兼顾。这表明，研究者

也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推动领域的进步。然而,这样的战略管理研究可能会让管理者“晕头转向”,还可能导致自己也“误入歧途”(Shapiro et al., 2007)。即,容易犯第三类错误(type III error)——不能解决管理实践中主要问题,反而关注次要的、低实用性的问题(Drnevich et al., 2020)。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战略管理领域应当为管理者发展出更实用、更严谨的洞见。^①有一位受访者称“管理者并不能从这个领域寻找到可行的方案”,还有一位认为“在法律案件中,战略管理领域的发现常常被忽视,但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发现却不会被忽视”。一位学者更是大胆断言:“现在期刊上的文章已经不再解决‘大战略’问题了。”

为了解战略管理学者如何定义他们自己的研究,我们从EBSCO数据库中收集了发表在SMJ(1980~2015年)上的文章关键词。EBSCO列出了1733个“作者提供的关键词”和1712个“主题词”。我们发现1118个(65%)“作者提供的关键词”和698个(41%)“主题词”在数据集中只出现了一次。对于这些独特的词汇,可以有多种解读,其中有一些其实无伤大雅。例如,这些词汇可能反映了战略管理理论已在多个情境中得到检验、这些年期刊主题发生了变化,甚至还可能体现了作者通过创造新的概念和术语,以寻求自身研究与现有成果的差异。然而,这些词汇的出现也可能反映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主题和理论过于分散,

这也与部分学者对未来战略管理领域碎片化的担心一致。

最后,我们还尝试通过主题建模去探讨此领域研究的关键主题是否以及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② 战略计划系统是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热点,但是在其后的一段时期里它的热度减退了。最近,利益相关者、创始人CEO、CEO继任和董事会等话题在期刊上更受欢迎。后续研究也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来评价文章所涉及的理论、方法、测量、研究情境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状况,以及获取对战略管理文献的独立评估,从而理解整个领域或某一细分领域(如竞争战略、企业战略、国际战略领域等)内的发展变化情况。这种建模方法可以用于评价主题的趋势或者研究流派的变化,评估一个领域的理论多样性;或者用于探讨特定方法是否被采用,或者被什么类型的文献采用。当然,它也可以用于探讨中国学术的主题、理论和方法以及潜在的兴趣如何随实践变化,以便将中国学者关注的主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所关注的主题作对比。

四、如何解决战略管理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

与其他商学院学科相比,战略管理领域的主题和理论都非常多样化。战略管理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单一的、完备的范式。单个的战略研究和整个领域层面所要求的多学科视角可

^① 这个观点在2016年AOM战略管理分部的五年总结报告中也得到了体现。这篇报告称,分部成员最关心的便是战略管理研究在指导管理实践和公共政策方面的实用性。

^② 感谢Provalis Research的Normand Peladeau和Amanda Robinson在文本分析方面提供的帮助。

以被视为一种优势，更何况该领域在解决复杂多变的管理问题方面有那么多成功的例子。除了战略管理，很难想到有第二个学科会使用多个传统学科的理论、有如此多样的主题。虽然如此，我们依然会自问，单个研究应该如何与该领域的核心相关联？这个领域有什么特殊贡献？它的边界和特征是什么？随着该领域的发展以及某些子领域的研究日益专业化，学者们将如何继续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呢？如今，每个子领域的研究都变得越来越深入，并且它们往往对于组织、企业领导以及决策过程都有截然不同的假设。

我们不是第一个发现这种现象的研究者，也不是第一个考虑如何应对战略管理研究的多样性的研究者。Strategy Research Initiative (SRI) 曾撰写了一篇非常有价值的读物，里面提供了一个包含开创性的文章和评论的清单，让博士生或者其他新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得以了解战略管理领域面临的核心挑战（参见 <http://strategy-research.net>）。SRI 还开发了一套判定高质量战略研究的标准，分别给以下内容提供了子标准：①所有研究；②所有理论研究（如理论阐释需要清晰、严谨、可测量和可信）；③所有实证研究；④理论检验研究（如使用与理论框架一致的可靠数据、保持分析单元一致、考虑有效代理变量的替代性解释、解决内生性问题）。为了促进所有战略研究的进步，让战略研究具有更强的连贯性，SRI 建议每一项研究都要建立在以往的高质量研究基础上（Oxley et al., 2010）。这些建议对于战略研究、管理学研究，以及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来说都至关重要。这里所提出的许多建议都与战略管理领域的垂直差异化有

关，而与水平化差异无关。因为这些建议只涉及战略研究的质量，而并不涉及将战略管理与其他领域区分开来的独特的主题、理论和方法。

Durand 等（2017）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否万物皆为‘战略’”？他们认为现有研究过于碎片化，需要进一步整合和重新定位，进而解决我们所提出的挑战。他们认为碎片化发生在战略研究的各个维度上——在理论上、在现象和分析问题的拓展上，以及在各个细分领域的发展中都有体现。他们认为战略管理研究的文献综述能对这个领域起到重要的整合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识别并促进多种流派的理论发展和实证分析的归纳和整合；

（2）中和实质在谈同一种现象，但预测和结果略有差异（有时甚至矛盾）的不同理论和结果；

（3）将单一的理论方法应用到一系列不同但相互联系的现象上；

（4）扩展战略管理现存的概念、理论和实证结果去分析新的现象；

（5）建立更加准确、系统的理论以支撑实证研究。这样的理论需要包含清晰定义的概念、明确的假设和逻辑自洽的因果关系。

这五个方面分别针对碎片化的五个来源：缺少累积的理论发展和实证分析；许多理论流派和实证分析都在解释同一种现象；理论范围过窄只能阐释特定的情境；新的现象需要新的理论概念进行解释；理论建构及理论之间的关系模糊、不够准确。我们认为在他们的特刊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宝贵的研究机会。同样我们也鼓励大家进行类似的文献综述以解决碎

片化问题。

Leiblein 等 (2018) 认为战略管理领域碎片化的其中一个来源是没有弄清楚什么使决策更加 (或更不) 具有战略性。经常有学者将战略决策等同于一切对组织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违反了事前分析 (*ex ante reasoning*) 逻辑, 别的领域也可以理所当然地说自己也是在研究“重要”决策。Leiblein、Reuer 和 Zenge 提出决策具有战略性需要具备三个关联特征: 同时期发生的决策与活动之间的相互关联; 其他经济参与者 (如竞争者和供应商) 的决策之间的相互关联; 不同时间的决策之间的相互关联。

上述战略决策的特征导致决策时产生一系列重要矛盾。例如, 如果一个决策撤销的成本很高或面临很高的不确定性, 采取更加灵活的决策或推迟决策对企业更有好处 (即时间之间的相互关联), 而担心竞争者抢先则可以更早达成协议 (即其他经济主体间的相互关联)。战略管理研究涉及很多此类矛盾, 包括是进行承诺型投资还是灵活型投资 (Trigeorgis & Reuer, 2017; Posen et al., 2018); 是竞争还是合作 (Hoffmann et al., 2018); 是自制还是外购 (Williamson, 1985); 是探索还是开发 (March, 1991); 以及是封闭式创新还是开放式创新 (Felin & Zenger, 2014); 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 战略管理领域几乎每一个根本性问题都会涉及此类矛盾和冲突。这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如何针对战略管理问题进行理论化。总体而言, 战略管理领域普遍认为不存在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普适性路径, 而是把一致性和对等性作为评估竞争优势或指导组织决策的通用准则。

例如, 研究认为在不同情境下承诺和保持灵活性各自都有其价值, 因此, 正确的战略决策应该是“视情况而定”。企业的研发应该外包还是自己研发? 这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只不过这里取决于交易 (或经济交换) 特征。因此, 战略管理研究要求我们进行对比分析, 并对矛盾的不同方面进行思考和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战略管理研究通常会以某种方式引用匹配原则。

经济交换的特征需要与组织形式的属性相匹配 (Williamson, 1991)。再举一个例子, 无论企业是实施成本领先战略还是差异化战略, 组织活动都需要与企业的竞争战略相匹配 (Porter, 1985)。

这些经典战略问题中所蕴藏的冲突和矛盾为战略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整合路径 (见图2)。如上文指出, 我们强调需要关注基本问题, 但是对于战略管理的核心问题的界定仍然存在争论。当然, 可能在所有商学院学科中都存在类似的问题。然而, 战略决策的三个特征是非常具体并具有理论支撑的。因此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标准来帮助学者将他们的研究和领域的核心联系起来。例如, 当学者在研究当代前沿的研究主题 (如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人工智能、数字平台) 时, 像以下这些类型的问题应该更受关注: ①这些现象或管理挑战需要组织做出什么决策, 这些决策与组织所做的其他决策有何联系? ②这些决策如何影响其他经济主体 (竞争者、供应商、互补方等) 的决策; 其他经济主体的决策又如何影响组织的这些决策? ③这里面涉及多少跨期的考虑 (例如, 它们如何推动未来的决策, 企业在进行承诺和

分期投资时面临什么不确定性)? 不管学者运用何种研究方法, 或者沿袭何种学术传统 (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心理学), 他们都可以运用上述三种关联之间的联系去判断一项决策是否为战略性决策, 进而为战略管理领域的历史核心问题添砖加瓦。Leiblein 等 (2018) 认为聚焦于研究战略决策的这几个维度非常有价值。这类研究与竞争优势理论和公司理论相关, 特别是不少理论都强调了不确定性在企业资源分配、竞争和公司治理决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 这为理论整合奠定了良好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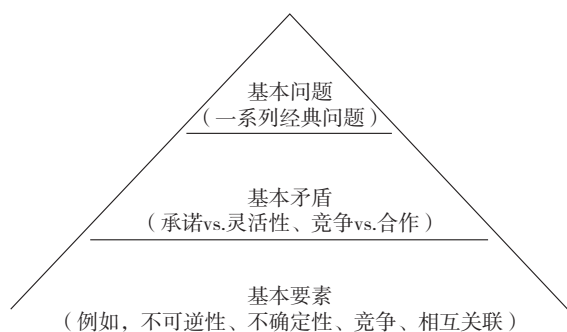


图2 战略决策作为“砖瓦”

Oxley 等 (2010)、Durand 等 (2017) 和 Leiblein 等 (2018) 也为战略管理领域整合提供了思路。例如, 考虑到战略管理各研究流派都已有一定的纵深度, 已变得高度专业化, 整合文献和综述有助于深入理解各个研究流派, 并为这些流派之间的文件建立对话基础。这些文章的意义超越文献综述本身, 能够为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整合、解决战略管理领域根本性问题做出独特贡献。

中国研究想要避免过度碎片化有多种方法, 如文献综述、重视战略管理经典问题和再次聚焦战略决策的特性, 都可能有利于研究的整合和知识的积累。中国独特的现象或制度变迁为

拓展战略管理理论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但是这类研究同时也要避免过于专注于识别策略。当下的研究要结合经典问题和战略管理研究的特性。如此一来, 新进入该领域的学者的研究才能够与该领域历史上所研究的核心问题联系起来。同时, 我们也关注到有许多研究开始从中国的管理实践中汲取智慧, 以便在中国的新兴应用情境和前沿课题中, 充分发挥战略管理的特性。在这方面, 我们也许可以在中国进行一次类似的调查, 了解学界和实务界对于战略管理这一学科的担忧, 从而使战略管理研究能够更好地满足实践的需要。

接受编辑: Haiyang Li

翻译: 罗银燕

校对: 李炜文、陈心雅

收稿日期: 2020 年 10 月 1 日

接受日期: 2020 年 10 月 2 日

作者简介:

Jeffery J. Reuer 是科罗拉多大学 Guggenheim 讲席教授。他的研究兴趣为运用组织经济学来研究企业发展活动。他近期的研究项目主要为战略联盟治理和设计、运用信息经济学和实物期权理论研究创业和国际商务现象。

Michael J. Leiblein 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战略管理副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实物期权行为理论、企业纵向范围和地理范围的联系、通过仿真来构建理论解释个体以及团体特征如何影响战略决策和企业绩效。

李炜文是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战略领导、家族企业以及公司创业。

参考文献

- [1] 徐二明、李维光：《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四十年（1978—2018）：回顾，总结与展望》，《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 年第 9 期。
- [2] Alchian, A. A. , & Demsetz, H.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777-795.
- [3] Angrist, J. D. , & Pischke, J. - S. 2009.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4] Angrist, J. D. , & Pischke, J. - S. 2010. The credibility revolution in empirical economics: How better research design is taking the con out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4: 3-30.
- [5] Ansoff, H. I. 1965. *Corporate strategy: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business policy for growth and expans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6] Barney, J. B. 1986. Strategic factor markets: Expectations, luck, and business strategy. *Management Science*, 32: 1231-1241.
- [7] Barney, J. 199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7: 99-120.
- [8] Barney, J. , & Zhang, S. 2009.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versus a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5: 15-28.
- [9] Barr, P. S. , Stimpert, J. L. , & Huff, A. S. 1992. Cognitive change, strategic 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enewal.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3: 15-36.
- [10] Bettis R. , & Blettner, D. 2020. Strategic reality today: Extraordinary past success, but difficult challenges loom. *Strategic Management Review*, 1: 75-101.
- [11] Bower, J. L. 1970. *Managing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process: A study of corporate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 [12] Brandenburger, A. M. , & Stuart, H. W. 1996. Value - based business strategy.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5: 5-24.
- [13] Brandenburger, A. M. , & Stuart, H. W. 2007. Biform games. *Management Science*, 53: 537-549.
- [14] Burgelman, R. A. 1983. A model of the interaction of strategic behavior, corporate context, and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8: 61-70.
- [15] Camerer, C. F. , Dreber, A. , Forsell, E. , Ho, T. - H. , Huber, J. , Johannesson, M. , ... , Wu, H. 2016. Evaluating replicability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s in economics. *Science*, 351: 1433-1436.
- [16] Camerer, C. F. , Dreber, A. , Holzmeister, F. , Ho, T. - H. , Huber, J. , Johannesson, M. , ... , Wu, H. 2018. Evaluating the replicability of social science experiments in Nature and Science between 2010 and 2015. *Nature Human Behavior*, 2: 637-644.
- [17] Caves, R. E. , & Porter, M. E. 1977. From entry barriers to mobility barriers: Conjectural decisions and contrived deterrence to new competi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1: 241-261.
- [18] Chandler, A. D. 1962.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Cambridge: MIT Press.
- [19] Chatain, O. , & Zemsky P. 2011. Value creation and value capture with fric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2: 1206-1231.
- [20] Chatterji, A. K. , Findley, M. , Jensen, N. M. , Meier, S. , & Nielson, D. 2016. Field experiments in strategy researc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 116-132.
- [21] Cyert, R. , & March, J. G. 1963.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22] Drnevich, P. L. , Mahoney, J. T. , & Schendel, D. 2020. Has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lost its way? *Strategic Management Review* , <http://dx.doi.org/10.1561/111.00000004>.
- [23] Durand, R. , Grant, R. M. , & Madsen, T. L. 2017. The expanding domain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the quest for integ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38: 4–16.
- [24] Eisenhardt, K. , & Martin, J. 2000. Dynamic capabilities: What are the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21: 1105–1121.
- [25] Felin, T. , & Zenger, T. R. 2014. Open or closed innovation? Problem solving and governance choice. *Research Policy* , 43: 914–925.
- [26] Felin, T. , & Zenger, T. R. 2016. Strategy, problems, and a theory for the firm. *Organization Science* , 27: 222–231.
- [27] Foss, K. , & Foss, N. 2005. Resources and transaction costs: How property rights economics furthers the resource – based 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26: 541–553.
- [28] Freedman, L. 2013. *Strategy: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9] Ghemawat, P. 2016. Evolving ideas about business strateg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 90 (Autumn): 1–23.
- [30] Ghemawat, P. , & Ricart Costa, J. E. I. 1993. The organizational tension between static and dynamic efficienc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4: 59–73.
- [31] Gibbons, R. 2005. Four formal (izable) theories of the firm?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 58: 200–245.
- [32] Grant, R. M. 1996. Toward a knowledge – 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7: 109–122.
- [33] Hambrick, D. C. , & Fredrickson, J. W. 2001. Are you sure you have a strategy?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 15: 51–62.
- [34] Hart, O. 1995.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5] Helfat, C. E. 1994.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in petroleum firm R&D. *Management Science* , 40: 1720–1747.
- [36] Helfat, C. E. 2018. *Ensuring a future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Chicago: Presentation at 2018 Academy of Management Meetings .
- [37] Helfat, C. E. , & Peteraf, M. A. 2009. Understan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Progress along a developmental path. *Strategic Organization* , 7: 91–102.
- [38] Henderson, R. , & Cockburn, I. 1994. Measuring competence? Exploring firm effects i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5: 63–84.
- [39] Holmstrom, B. 1979.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 10: 74–91.
- [40] Hoffman, W. , Lavie, D. , Reuer, J. J. , & Shipilov, A. 2018. The interplay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39: 3033–3052.
- [41] Huded, C. , Rosno, J. , & Pradad, V. 2013. When research evidence is misleading. *Virtual Mentor* , 15: 29–33.
- [42] Ioannidis, J. P. A. 2005. 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 *PLoS Med* , 2: e124.
- [43] Katila, R. , & Ahuja, G. 2002.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earch behavior and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45: 1183–1194.
- [44] Klein, B. , Crawford, R. A. , & Alchian, A. A. 1978.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 *Journal of Law and Eco-*

nomics, 21: 297-326.

[45] Klepper, S., & Simons, K. L. 2000. Dominance by birthright: Entry of prior radio producers and competitive ramifications in the U. S. television receiver indus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 997-1016.

[46] Kogut, B. 1991. Joint ventures and the option to expand and acquire. *Management Science*, 37: 19-33.

[47] Kogut B., & Kulatilaka, N. 1994. Operating flexibility, global manufacturing, and the option value of a multinational network. *Management Science*, 40: 123-139.

[48] Kogut, B., & Zander, U. 1992. Knowledge of the firm,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and the replication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Science*, 3: 7383-7397.

[49] Learned, E. P., Christensen, C. R., Andrews, K. E., & Guth, W. D., 1965. *Business policy: Text and cases*. Homewood: Irwin.

[50] Leiblein, M. J., Reuer, J. J., & Dalsace, F. 2002. Do make or buy decisions matter? The influence of governance on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 817-833.

[51] Leiblein, M. J., Reuer, J. J., & Zenger, T. R. 2018. What makes a decision strategic? *Strategy Science*, 3: 558-573.

[52] Levinthal, D. A., & March, J. G. 1993. The myopia of learn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4: 95-112.

[53] Levitt, B., & March, J. G. 1988.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 319-338.

[54] Lieberman, M. B., & Montgomery, D. B. 1988. First - mover advantag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9: 41-58.

[55] Lippmann, S., & Rumelt, R. 1982. Uncertain imitability: An analysis of interfirm differences in efficiency

under competi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3: 418-438.

[56] Mahoney, J. T., & McGahan, A. 2007. The field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within the evolving science of strategic organization. *Strategic Organization*, 5: 79-99.

[57] Mahoney, J. T., & Qian, L. 2013. Market frictions as building blocks of an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 approach to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4: 1019-1041.

[58] March, J. G. 1991.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2: 71-87.

[59] McDonald, G., & Ryall, M. D. 2004. How do value creation and competition determine whether a firm appropriates value? *Management Science*, 50: 1319-1333.

[60] McGrath, J. E. 1981. Dilemmas: The study of research choices and dilemma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5: 179-210.

[61] Mintzberg, H. 1990. *Strategy formation: Schools of thought*. In J. Frederickson (eds.), *Perspectives on strateg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62] Monteverde, K. 1995. Technical dialog as an incentive for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Management Science*, 41: 1624-1638.

[63] Muthukrishna, M., & Henrich, J. 2019. A problem in theory. *Nature Human Behavior*.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18-0522-1>.

[64] Myers, S. C. 1977.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 147-175.

[65] Natividad, G., & Rawley, E. 2016. Interdependence and performance: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firm scope. *Strategy Science*, 1: 12-31.

[66] Nelson, R., & Winter, S. G.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7] Nickerson, J. A., & Zenger, T. R. 2004.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The problem-solving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Science*, 15: 617–632.

[68] Ocasio, W. 1997. Toward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8: 187–206.

[69] Oxley, J., Rivkin, J. W., Ryall, M. D., & the Strategy Research Initiative. 2010. The Strategy Research Initiative: Recognizing and encouraging high-quality research in strategy. *Strategic Organization*, 8: 377–386.

[70] Peteraf, M. A. 1993. The cornerston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resource-based 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4: 179–191.

[71] Poppo, L., & Zenger, T. 1998. Testing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the firm: Transaction cost, knowledge-based, and measurement explanations for make or buy decisions in information servi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 853–877.

[72] Porac, J. F., Thomas, H., & Baden-Fuller, C. 1989. Competitive groups as cognitive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Scottish knitwear manufacture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6: 397–416.

[73] Porter, M. E.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Free Press.

[74] Porter, M. E. 1985.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75] Posen, H. E., Leiblein, M. J., & Chen, J. S. 2018. Toward a behavioral theory of real options: Noisy signals, bias, and learn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9: 1112–1138.

[76] Prahalad, C. K., & Bettis, R. A. 1986. The dominant logic: A new linkage between diversity and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7: 485–501.

[77] Reuer, J. J., & Leiblein, M. J. 2000. Downside risk implications of multinationality and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 203–214.

[78] Rumelt, R. P., Schendel, D. E., & Teece, D. J. 1991.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2: 5–29.

[79] Rumelt, R., Schendel, D. E., & Teece, D. 1994. *Fundamental issu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A research agenda*.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80] Schendel, D. E., & Hofer, C. W. 1979. *Strategic management: A new view of business policy and planning*. Boston: Little, Brown.

[81] Shapiro, D. L., Kirkman, B. L., & Courtney, H. G. 2007. Perceived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the translation problem in management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249–266.

[82] Shaver, J. M. 1998. Accounting for endogeneity when assessing strategy performance: Does entry mode choice affect FDI survival? *Management Science*, 44: 571–585.

[83] Shenkar, O. 2017. Manage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 1–11 (In Chinese).

[84] Simon, H. A. 1976.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Third Edition, London: The Free Press,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85] Stokes, D. E. 1997. *Pasteur's quadrant: 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86] Teece, D. J., & Pisano, G. P. 1994.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firms: An introductio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3: 537–556.

[87] Teece, D. J., Pisano, G., & Shuen, A. 1997.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8: 509–533.

[88] Trigeorgis, L. , & Reuer, J.J. 2017. Real options theory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8: 42–63.

[89] Tripsas, M. , & Gavetti, G. 2000. Capabilities, cognition, and inertia: Evidence from digital imag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 1147–161.

[90] Tsui, A. S. 2006. Contextualization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 1–13.

[91] Wernerfelt, B. 1984.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5: 171–180.

[92] Williamson, O.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93] Williamson, O.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94] Williamson, O. E. 1991. 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 269–296.